

《世说新语·方正》及“方正”观研究

杨颖

摘要:《世说新语·方正》的取材与传统方正观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前人已屡有提及,但大多只是着眼于某一具体事例。本文在此基础上指出《方正》中“方正”的背景已经朝廷政事拓展到了私人交往的环境,《方正》的重心在于强调士人维护其个人和家族尊严的心态,并分析了这种心态产生的历史原因。进而通过对《方正》总体上的考察,阐述了《方正》中“方正”寓意的特质。同时,对《世说新语》研究中门类与具体事例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世说新语;方正;士族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0)01-0090-04

《世说新语·方正》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郭淮作关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屡有战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当并诛。使者征摄甚急,淮使戒装,克日当发。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淮不许。至期,遣妻,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行数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于是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与宣帝书曰:‘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①

所谓“方正”,通常的解释往往强调其端方正直之意^②,但据此概念来看这个故事,则不免让人困惑。郭淮起初的“至期,遣妻”还颇有尊重国法,忍痛离妻的方正意味,百姓之“号泣追呼”尤可衬托其堂堂正气;但此音未绝,他就“命左右追夫人还”,还“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与此前行为相比,反差极大,而其理由也谈不上有力。如果说前半段着力表现其方正的话,此刻的徇情之举却立即将之消解得一干二净,那么,这个故事究竟在哪

里谈得上“方正”呢?

在两汉时代,“方正”经常作为选举科目之名称出现,有时也会指代通过此科晋身的士子^③。而“方正”作为形容评价之词,含义也与其作为科目时的要求息息相关。《汉书·爱盎晁错传》中记载了爱盎对策时的一段话:

“诏策曰‘直言极谏’,愚臣窃以五伯^④之臣明之。臣闻五伯不及其臣,故属之以国,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屈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⑤

爱盎的论述显然是以春秋名臣为例,从朝廷对臣子立身和勤政的要求出发,提出了时人评判方正之士的一系列标准,而其重点更在于臣子的立朝辅政。

这种观念无疑已为后人所接受。如,在《世说新语笺疏·方正》“王大将军既反”条后,余嘉锡案:“伯仁临难不屈,义正词严,可谓正色立朝,有孔父之节者矣。世说方正之篇目,惟伯仁、太真及钟雅数公可以无愧焉。其他诸人之事,虽复播为美谈,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82—283页。

② 如《汉语大辞典》的解释是:指人行为,品行正直无邪。《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正直。翻译成英语,也往往是upright, righteous之类。

收稿日期:2007-08-07

作者简介:杨颖(1980—),女,江苏淮安人,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典籍与文化。

③ 《汉书》卷85《谷永杜邺传》载:“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发,诏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后又云:“其夏,皆令诸方正对策。”迄桓、灵帝时,仍是如此。如《后汉书》卷7《孝桓帝纪》:“(元嘉二年)癸卯,京师地震,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言直谏者各一人。”

④ “五伯”即“五霸”。

⑤ 《汉书》卷49《爱盎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94页。

皆自好者优为之尔。”^①此处，余嘉锡显然是依此标准将周顗、温峤、钟雅当作方正的典范^②，而同时，亦颇可见余氏对“其他诸人之事”列入《方正》的不以为然。

的确，以传统观念来看《方正》，我们会发现颇多抵牾之处，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爰盎定位“方正”的主要着眼点在臣子立朝勤政，然而，《方正》的重心却不在此。在《方正》凡66条中，有关军政之事的仅有17条，其他三分之二强的内容则涉及士人的交游、联姻等多个方面，也就是说，在《方正》中，“方正”的背景已经从朝廷政事拓展到了私人交往的环境。

其次，在有限的涉及政事的17条中，也出现了与传统的“方正”观念相龃龉的情况。除上述被余嘉锡认为无愧于方正这一篇名的周顗、温峤、钟雅之外，其他如陈群、陈泰、华歆、孔坦、刘简诸人，所行多遭后人质疑甚至贬斥。

“魏文帝受禅”条记录了“魏文帝受禅，陈群有戚容”^③且于文帝前坦言服膺先朝之语，将陈群此举视为方正。对此，李慈铭评曰：“案陈群自比孔父，义形于色。可谓不知羞耻，颜孔厚矣！”^④蒙初亦斥之“所言正佞之尤”^⑤。

而即使不谈类似陈群这样因辅佐曹氏而被认为大节有亏者，单就具体参与政事的事例而言，我们也发现《方正》的选材对爰盎所谓“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原则的严重背离：

“苏子高事平”条：苏峻之乱后，百姓凋敝。

“王、庾诸公欲用孔廷尉为丹阳”。照理说，艰难时事，正是臣子出力之时，况且掌管都城之所在，也是一项荣誉，说明才能的被肯定。但孔坦的回答却是：“肃祖临崩，诸君亲升御床，并蒙眷识，共奉遗诏。孔坦疏贱，不在顾命之列。既有艰难，则以微臣为先，今犹俎上腐肉，任人脍截耳！”然后“拂衣而去”^⑥。国运艰危，孔坦所关注的却是自己先前未受重用的颜面之失，在其心中，国家利益实在是

比不上自己尊严重要的。用刘辰翁的话来说，就是“小人语，岂识国家大体，见辱方正”^⑦。

“刘简作桓宣武别驾”条：主人公刘简是以“刚直”见称的人物。作为桓温属下，他“尝听记，…都无言”，桓温问他“何以不下意”。他的回答很简单：“会不能用”^⑧。在这里，传统的忠臣直谏、为国为民的意识荡然无存，全是计较个人名誉、尊严之心。

事实上，我们透过《方正》里士人们的行止言谈所看到的正是士人维护其个人和家族尊严的心态，而最能体现这种心态的，一方面，是高门望族的后代对所谓“小人”或是后出门户的轻薄和拒绝；另一方面，是高自标置的士人在权臣乃至最高统治者面前对个人尊严和家族荣誉的坚持。前者如手批刁协的周嵩、拒婚桓温的王述；后者如坚持不与曹操交往的宗承、数落武帝的王济。在维护个人尊严和家族荣誉的问题上，士人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坚决和坦率。然而，随着士人的尊严和言论自由则受到了更多的尊重，传统“方正”观中强调国事的观念却变得相当淡薄。余嘉锡对这种现象曾做过深刻的描述：“盖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故奉亲思孝，或有其人；杀身成仁，徒闻其语。王祥、何曾之流，皆不免党篡。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竟成虚语。六代相沿，如出一辙，而国家亦几胥而为夷。”^⑨

作为魏晋南朝前半期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方正》所反映的这一特点是与朝代更替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士族阶层蓬勃发展的状况相联系的。唐长孺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后世往往不满于五朝士大夫那种对于王室兴亡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实在门阀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士大夫可以从家族方面获得它所需要的一切，而与王室的恩典无关，加上自晋以来所提倡的孝行足以掩护其行为，因此他们对于王朝兴废的漠视是必然的，而且是心安理得的。”^⑩

士族势力的蓬勃发展，固然是魏晋士大夫强调个人和家族尊严而淡化国事地位、臣子职责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足以就使其轻易漠视皇室的尊严。其实，在《方正》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主人公们看似无所顾忌的言语还是有一定限度的。“明帝在西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15页。

② 考“方正”篇中叙述此三人言行的条目，共有8条，其中第23条仅是周顗对王导的评论，第29条是有关士人交往，其它六条（第30-35条）均是主人公在有关国家政事的问题上坚持原则，不屈于威势，所谓“正色立朝”之属。

③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81页。

④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81页。

⑤ 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⑥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17-318页。

⑦ 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第285页。

⑧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26页。

⑨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6页。

⑩ 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堂”条中，周伯仁在明帝前坦言当今并非圣治，险些招致杀身之祸，但实际上，他对自身行为的后果有着充分的估计，心知“罪不足至此”^①。刚直如周伯仁尚且这样，其它的人就更是如此。在有关政事的十几条中，有不少表现了主人公面对帝王或王敦这样的权臣并不跟风附和，颇有所谓“正色立朝”的意味。然而笔者注意到，这些看起来对立性的言论，往往缺乏行动性，也就只是说说而已，体现出说者在精神上的高度就够了。毕竟从某种程度而言，即使在此大背景下，皇权也并不处在完全被动的状态。名士高门之惨遭屠戮，代有其人，门第高华如王谢，亦不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可以说，时局的动荡和政治的黑暗也进一步导致了魏晋士人对政治的疏离，也就难怪《方正》中有关政事篇目从分量到内容都偏弱了。

然而，不管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方正》所记载的士人言行毕竟与传统的“方正”观相去甚远。事实上，《方正》66条中，包括上述事例在内，至少有16条前人已经明确提出了质疑^②，其中，“非方正也”、“未是方正”、“正都无关方正”、“宁是方正”、“何与方正”甚至“见辱方正”、“见谗方正”^③的评价不但是对事迹本身“方正”特质的直接否定，更让人对《方正》本身的选材产生怀疑。那么，究竟是《方正》本身选材不当还是这里的“方正”另有寓意呢？

笔者认为，与其以几个抗颜直陈的例子为基础去寻找《方正》对传统观念的继承，不如换个角度，将《方正》综合考虑，去寻找《方正》本身所强调的特质。范子烨在《世说新语研究》中指出方正观念在六朝“特指士人之自我标持，行事不苟”^④。对此观点，笔者认为，“自我标持”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正是魏晋思想的解放和士族阶层的形成奠定了

士人充满自信的高自标置；但“行事不苟”却并不尽然。一方面如前文所说，受时势或皇权制约，士人在坚持不苟行事之外，也难免有回避甚至屈从的敷衍之举。另一方面，士人基于个人尊严的行事不苟从国事的角度来说也许恰又是苟且之处。不说别的，郭淮追妻该如何解释？

其实，纵览《方正》全文，尤其是后人提出质疑甚至诟病的条目，有一点贯穿其中，那就是——坦率。钟雅、周顗等人面对强权不屑虚与委蛇是坦率，郭淮后悔遣妻，大张旗鼓地追还也是坦率，甚至王爽的卖弄、羊琇的挟贵而骄也是一种坦率。无论从传统观点看来是对是错，《方正》中的主人公都在坦率表达心中的想法，而这种表达，既不强求与过去的言行一致，又不考虑对时势的责任，渗透着强烈的个人性情。这一点，在受政治压力和强权限制较少的个人交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那些看似与方正关系甚微的篇目里，也多是表现士人之我行我素，率性而为，坦率的特色一直贯穿其中。比如刘辰翁评价为“似狎尔，非方正也”^⑤的“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条：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君自用君法”^⑥

面对王衍的拒绝，庾子嵩“我自用我法，君自用君法”之答简直直率得可爱。又如王世懋曰：“正都无关方正”^⑦的“周叔治作晋陵太守条”：

周叔治作晋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别，叔治以将别，涕泗不止，仲智恚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惟啼泣！”便舍去。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临别留涕，抚其背曰：“奴好自爱。”^⑧

兄弟三人离别，通过三人坦然而直率的表现，我们感受到叔治的情深与脆弱、仲智的豪爽与性急、周侯的温情与周到，个人性情跃然纸上。其它如深公自夸、孔坦辞任，虽被讥为“见谗方正”、“见辱方正”，也分别是深公不耐遭黄吻年少议论、孔坦记恨先前遭轻视的心理的自然反映。

传统所谓的“方正”，往往包含了相当多的道德意义。但如《世说新语·方正》，当我们在士人们的率性而为中来看“方正”，或多或少觉得他们与传统的一本正经相比很有些走调。魏晋士人知道自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11页。

② 由刘辰翁、王世懋、凌蒙初、李贽等注者提出，分别涉及“魏文帝受禅”条、“杜预之荆州条”、“杜预拜镇南将军”条、“山公大儿短”条、“向雄为河内主簿”条、“卢志与众坐”条、“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条、“阮宣子伐社树”条、“周叔治作晋陵太守”条、“苏子高事平”条、“梅颐尝有惠于陶公”条、“后来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条、“王长史求东阳”条、“桓公问桓子野条”、“王公欲请江卢奴为长史”条、“王爽与司马太傅饮酒”条等，参见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

③ 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第273、273、277、290、291、285、289页

④ 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0页。

⑤ 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第273页。

⑥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03页。

⑦ 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第277页。

⑧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08页。

己想要什么，并且坦率的表现出来，也许他们的动机、心态未必那么“方正”，也许他们一时的“方正”之行并不能贯彻始终，但他们的行为本身，没有造作，不讲虚饰，正是“方正”的最好注脚。

对于《方正》之“方正”与传统“方正”观的龃龉，研究者往往将之归类为《世说新语》其它门类中也存在的内容与类目不太一致的现象。对此种现象的研究，也往往落脚于《世说新语》的成书到底是刘义庆独立编纂还是其门下众人合力所为的问题上。然而即使是一些对《世说新语》作了系统研究的学者，在门类问题上也只是大略带过，并未进行具体分析。在笔者看来，《世说新语》一书无论是独立完成还是成于众手，纂集的成分是多还是少，其记录和分类本身，就足以体现当时人们的欣赏趣味和关注点。所以，我们看《世说新语》的具体门类，大可不必将之拉入现在的概念体系。的确，三十六类目言简意赅，富有象征性。一言其名，马上可以想到相关的哲学内容、时代精神，以至于说到“名士风度”，只要列出《世说新语》中《任诞》、《简傲》等篇就是绝佳的材料，列出“孔门四科”，马上有人解释儒家传统与《世说新语》割不断的联系。然而笔者以为，在某种确定的传统、精神下去

看《世说新语》，固然方便定性研究，但也难免使一个个栩栩如生小故事失去其鲜活的特质，成为传统、精神的符号化论述。其实，魏晋时期多种思想的碰撞、交融，不仅显露于大的门类之间，更具体的表现在某一个门类之中。也许是因为类目名称太易于总结归纳，研究者们对类目内部的具体事例普遍重视得不够。尤其是像《方正》这样的类目，由于类名本身就带有很深的传统寓意，以至于研究者们只是满足于指出具体事例对于传统的背离，却忽视了其在整体上体现出的魏晋特色。依笔者所见，正是在这样的类目中，相对于传统而言的种种差异和矛盾，才能更深刻地说明魏晋文化的独特性。

在《世说新语》中，《方正》紧接在孔门四科之后，地位相当重要，也历来被研究者们认为是代表传统价值而获肯定的类目。而《方正》所认可的“方正”，已不仅仅是传统的观念。通过《方正》中人物坦率的行事和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的性情取代士人在国家大事中的作为成为时人关注的重点。

《方正》之“方正”，也有不畏强权、蔑视权贵的内涵，但它的基点已脱离了对国事负责的臣子模式，而是强调个人尊严、家族荣誉，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流露出的高度自信、坦诚率直。

On Righteousness in Shih-shuo Hsin-yu

YANG Ying

(School of Literal Arts , Nanjing University, Naning , Jiangsu , 210093 , China)

Abstract: The materials selected in *Righteousness Chapter* of *Shih-shuo Hsin-yu* seem quite contrary to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righteousness. Heretofore, several discussions on this question are not complete. In fact, the background of righteousness in *Righteousness Chapter* has expanded from political issues in the court to personal issues in the family. The *Righteousness Chapter* emphasizes the dignity of nobles own and his family. This psychology is a result of the flourish of the estate of aristocratic families and the passive influence of the dark political situ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idea of righteousness which seems to be deviated from traditional moral is just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honesty and straightforwardness for the noble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y.

Key words : *Shih-shuo Hsin-yu* (世说新语) ; *Righteousness* (方正) ; Wei and Jin; aristocratic family

(责任编辑:石磊)